

目 录

忆父亲刘方岳先生·····	刘君卫	(1)
回忆刘方岳老师二、三事·····	殷以柔	(14)
王家烈生平简介·····	林国忠	(18)
忆肖文灿师·····	严栋开	(33)
近代学者、诗人、书画家姚华·····	邓见宽	(39)
严修与贵州经世学堂·····	陈廷璜	(50)
张协陆与“民八”事件·····	张汝弼	(57)
郭重光与贵阳耆老会·····	邓庆棠	(70)

※

※

※

解放前贵州的烟草种植与卷烟工业·····	蓝 天	(90)
贵阳肥皂行业的变迁·····	周庆全	(102)
贵阳电池生产发展概况·····	张子秀 杨斌臣 刘德兴	(108)
解放前的贵阳市照相行业·····	吴传德	(115)

※

※

※

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在贵阳·····	于怀卿	(132)
记贵阳青光抗战工作团·····	朱志国 王蕴瑜	(137)
贵阳的“新生活运动”·····	赵汝榕	(143)
抗战初期贵阳话剧活动片断·····	蓝 奇	(147)

抗日战争前后警政简述·····	杜伯珣	(149)
国民党警察界的见闻·····	贺俊异	(152)
在解放前贵阳市警察局概况·····	雷毓灵	(171)

※

※

※

贵阳名胜古迹

观音洞·····	本会文史办公室整理	(175)
河滨公园·····	本会文史办公室整理	(177)
相宝山·····	本会文史办公室整理	(179)

※

※

※

《贵阳文史资料选辑》第一——七辑目录·····		(180)
封二	娄山关·····	孟光涛
封三	山水·····	蒋梦谷

忆父亲刘方岳先生

刘君卫

先父刘方岳先生，贵州贵阳人氏，一八九六年生于广西桂林，一九八一年歿于贵阳。一九一九年肄业于日本明治大学经济系，受业于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鼻祖河上肇教授门下。尔后求学于伦敦经济学院，师从拉斯基教授，研讨殖民经济发展史论。因国内经济来源断绝，转赴法国勤工俭学，置身于工人革命运动中学习马克思主义。回国后，先后执教于贵州大学（周西城时代）、达德学校、贵阳高中、贵阳中学，历任贵州大学、贵阳师院历史系、经济系副教授、教授。他一生献身于贵州教育事业，是在贵州宣传马列主义理论与史学的前辈。在他的影响下，许多贵州青年走上革命道路，其中不少人奔赴延安以及其它解放区，至今多成为党的忠诚干部。

一、维新与革命的启蒙

笔者的祖父刘子恒老先生，清末入京会考，进士及第。一八九四年任广西阳朔县令，因倡导维新强国思想，面斥道台，愤而投阳朔江自尽。一八九六年冬月十六日，先父刘方岳遗腹生于桂林，乳名腹生。

清末民初，先父求学于贵阳达德学校和南明中学，学名刘锡麟，以效徐锡麟革命为志。贵州办新学的创始人凌秋鹗

老先生，在贵阳达德学校宣传共和、反对帝制的先进思想，给少年时代的先父以极大的思想影响。达德学校的老师黄齐生老先生，于列强瓜分中国的危亡中呼吁爱国，以发扬岳飞的爱国精神相激励，赠号方岳。

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，贵州革命党人举事响应。是年正值方岳先生由达德小学毕业，革命党人拟于毕业典礼举行童子操练时，以真假枪相混，谋刺贵州巡抚。青年时代的刘方岳先生积极参与谋事活动，这既出于爱国心切，也以此图报清廷杀父之仇。

二、东渡日本

一九一七年，刘方岳先生以贵州留日会考第一名公费生，东渡日本求学深造。同榜有龙仲衡、谢六逸、李淑元、刘松生、易志澄等八名（龙仲衡先生行至黔东，因故返回贵阳，东渡未成）。行至湖南洪江，当时在铜仁任职的黄齐生老先生率其外甥王若飞来会，一并东渡日本。在日本求学期间，黄老先生继续对贵州诸生讲授国学，发扬爱国思想。讲课之余，又为诸生操劳生活杂务，诸如日常煮饭，乃至洗衣。黄老先生的身教言教，感人至深。

一九一九年在北京爆发了伟大的“五四”运动。留日学生群情激愤，为拯救祖国危亡，集会于东京芝公园（日文汉语译音为西巴戈。先父于逝世前夕，还曾对来访的《贵州日报》记者回忆这段往事，老泪横流，并感慨地说：“我是个多事之人”）。当时郭沫若主持了这次爱国集会。继郭发表爱国热情洋溢的演说之后，先父登台演说，历数卖国贼之罪责，怒斥日人之犯山东，为祖国主权领土不受侵犯而呐喊。相继发言者五、六人，集会者达数百人。会后集队游行于东

京市内，经小石川区（银座）皇宫附近，图震动天皇。下午三时许，在返校途中到达水道桥（明治大学附近），日军警挑衅，我留学热血青年在街头与军警相搏。游行之后，东京留日学生集会于源顺号餐馆和中华楼餐馆，呼吁抵抗日人侵华。事发之后，黄齐老振臂高呼：“热血男儿，岂能置国家安危于不顾而闭门读书乎？”在日贵州青年学子纷纷退学，王若飞（明治大学政治系一年级学生）、刘方岳（明治大学经济系一年级学生）、刘劲夫（即刘松生亦经济系学生）相继罢学，在黄齐老的率领下愤然归国，探寻救国之路。李淑元早在运动之前与日人不和而先回国，谢六逸继续留在日本，大学毕业后才归国。

三、晋见孙中山先生

自日本归国，军阀当政，茫茫上海，无处可栖，遂投宿于原达德学校毕业生李敬如昆山（上海附近的市镇）祠堂破屋。身居陋室而仍以天下为己任，黄齐老率诸学子晋见孙中山先生，探寻救国之道。一九一九年夏，至上海环龙路十九号拜会孙先生（先父在八十高龄时，一再肯定孙先生住宅是环龙路十九号）。当孙先生来到小会议室时，在座者均肃然起立致敬久久凝视孙先生。爱国赤子，热泪盈眶。孙先生讲话大意为：革命尚未成功，中华青年，具有爱国热血传统，浩气长存。并称赞诸生反口侵华之举，期望贵州青年继续奋斗，拯救中国。当时孙先生正陷于革命数举而屡遭失败之中，孙先生一再说明他的主张之正确，但是究竟怎样达到革命的目的，还是感到茫然。

救国之路何在？先父系日本社会主义学家小田森二郎教授和河上肇的学生（当时河上肇是年轻教师，已有马克思经

济学说倾向），受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启蒙，因之而欲奔赴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故乡——英国求学。求得黄齐老的赞许后，师生二人一同前往苏州拜见康有为先生（康与黄原有师友旧谊），求他修书一封给他的女婿、当时的驻英公使罗仁仲加以关照。客人说明来意之后，康纵谈国是，大谈中山误国，民乱而国乱（他所指民乱即人民革命运动）造成中国之贫弱，大赞明治天皇之果断才干，国与民一体而振日本之国威，叹惜光绪之软弱。当时，先父方二十余岁，血气方刚，按捺不住革命之激情，据理以对，大赞孙先生之革命主张。康色厉而词严曰：“狂徒后生”！转而和颜悦色曰：“奇士也，黔人”！说罢，急速走至书案，提笔挥书，嘱罗仁仲深加关照，并书：“忠信立其本”五个大字横幅赠刘方岳。

谢别康有为先生，师生二人大笑回返上海。适值国内掀起赴法勤工俭学之高潮，黄齐老四处奔走，为黔籍诸生筹措路费。当时贵州在上海经商的蔡恒武老先生，思想开明，手中掌握了一笔贵州军政巨款，愿鼎力支持。但该款需王伯群的同意才可动用，黄老又奔走游说王伯群，王也打算借此以培养自己在政界的势力，于讨价还价之中，同意资助每人三百银元，并允诺给刘方岳一人在英读书费用（因王看了康有为写的信件）。

四、西巡欧洲

黄齐老率贵州学子二十余人登船奔赴欧洲，王若飞、刘松生、梅梅生、冉为民等至马赛登岸到法国谋生求学，刘方岳与严溥泉绕过直布罗陀海峡踏上英伦三岛。

到了英国，得到罗仁仲之助，介绍英人 Resius 女士在

伦敦南部的South Kensington Town 补习英语，后入伦敦经济学院攻读殖民经济发展史论。在伦敦期间，某日伦敦海关来电话嘱先父前往认领可疑之人，至海关竟是黄齐老。黄老当日已是美髯公，不通英语，英人疑其是俄特，黄老用汉语说系伦敦经济学院刘方岳的老师。证人既到，黄老遂获释。年余，王伯群在贵州政界倒台，经济款项断绝，遂赴法勤工俭学。

一九二一年先父在法国结识了不少爱国志士，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变动，在劳动中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学说。首先在枫登白露认识了李隆郅（即李立三同志），由于两人思想都很进步，一见即结为至交。刘经李推荐作为枫登白露地区中国留学生的代表，到里昂参观里昂中法大学，此举为以后夺取里大作了准备。在蒙达尼（巴黎至里昂间一城镇）认识了蔡和森和他的妹妹蔡畅，并拜会蔡母。以后与李维汉、李富春共组工学世界社，被选为理事。作为理事代表，应周恩来同志之召，各社团代表集会于巴黎周恩来所住旅馆，商讨攻占里昂大学事宜。周号召组织先遣队，陈毅、蔡和森、刘方岳等自愿率队冲击里大。里昂中法大学，系为中国留法学生所创办，当时北洋军阀驻法公使陈铎，在国内组织了一批官宦子弟强占里大，不许勤工俭学学生进读该校。双方争夺，陈铎与吴稚晖勾结法国当局军警，用武力押解勤工俭学生先遣队员一〇四人至马赛。先父被先遣队诸难友选为团长与法方交涉，遭到法军警的殴打。法方以武力押解学生登船回国，这时正值蔡元培先生赴法考察教育，请他帮助解决，他既无权也无意协办。事发之后，周恩来同志赶至马赛，船已启航。周恩来同志在万分气愤中写了一文寄回天津某报，慨叹中华少年勇士（此文已为清华大学党史教研室编入《青年时代的

周恩来》一书第一集)。

五、革命与动摇

刘方岳先生被押解回国之后，返回贵阳，执教于达德母校，宣传革命，讲巴黎公社壮史，办贵阳中华书局，发行科教及进步书刊。一九二六年大革命在广东掀起，当时主黔的周西成下令追捕共产党嫌疑犯刘方岳，先父遂逃至武汉。一日，李立三同志来会，约先父参加革命。先父以本人系遗腹所生独子，老母无人奉养，婉言拒绝，但谓可给党作些工作。李立三同志大骂刘方岳为胆小鬼之后，扬长而去。先父於矛盾苦闷之中，走向商业界，在上海作了黔人王从树在沪所开德胜棉花号的经理。在一九二七年大风暴中，虽来往于巨商大贾之中，也为党作了一些工作。蒋介石发动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，大屠杀开始了，王若飞同志突然登门，在先父处隐蔽了三五日，又动员参加革命活动，先父仍以回答李立三的话相告，但仍愿为党作些工作。后经党安排以商贾为保，出面营救陈延年同志，请上海名律师吴凯声出庭为陈作辩护。

一九二八年王伯群出任国民党南京政府交通部长，王伯群来召，因感王资助出国读书之谊，作其秘书，但不愿卷入反动政治漩涡，旋即请调返贵州，出任交通部所属贵州电报局监理。大革命时期在黄埔军校参加革命活动的缪象初，由外地返回贵州，来邀先父到紫云洞马山漕改造土匪（实为破产农民），建立农工政权。王伯群获悉后，大骂刘方岳叛逆不道，遂与断交。至紫云事败后，先父顿作狂人，疯病真假有之，图以过关。不料，原达德学校学生冯剑飞出任保安处长，来请先父出仕以探虚实，作其秘书年余。后返回学界，

继续教书生涯。

六、卷入民族救亡的激流

二十世纪三十年代，中华民族掀起抵抗日本侵略的救亡高潮，贵阳也不例外。自一九三一年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先父即与谷友庄、尹树坚、何治华、何治贤等人投入救亡运动。以后在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地下组织的领导下，刘方岳先生怀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新仇旧恨，卷入抗日救亡的激流之中。中共贵州省工委负责人林肯、秦天真、黄大陆、李策等同志，代表党给予先生以指导，展开抗日革命活动：（1）一九三五年“七·一九”事件。国民党反动派大肆逮捕共产党人，林肯同志壮烈牺牲，秦天真等同志更加隐蔽，不能公开活动，先父於白色恐怖中，四处奔走，搜集敌特动态，传递消息，帮助许多同志脱离虎口，其中如严金秋同志得先父之助远走重庆。（2）在革命低潮中继续奋斗。“七·一九”事变之后，先父与共产党人丁树奇、谢凡生、李策等同志密切联系，於一九三六年由谢凡生同志主编《黔风报》，先父大量撰文，以幽默、讽刺的笔法，揭露黑暗，阐明真理。（3）投身全面抗战激流之中。一九三七年黄大陆同志奉中央之命，自延安来贵州，主持地下党工作。黄是先父旧交，通过先父与内亲地下党人李策、凌毓俊联系。在黄的指导下，公开出面先后主持组织了几个抗日民众团体，计有“贵阳抗敌后援会”（任主席），“文化界抗敌后援会”（任主席）。与丁树奇、高言志、蒋仲仁、谢凡生、肖家驹、熊穆敬，赵毓祥、王启霖、凌毓俊等同志极积开展抗日文化宣传活动。一九三八年初秦天真同志由延安回贵州，接着邵公文同志自武汉来贵阳开设生活书店，发行《资本论》等革命书刊，使

贵阳知识界走向学习革命理论的高峰。在邵公文、熊蕴竹等中共党人的巧妙安排下，提供了大量革命书刊，由刘方岳、蒋仲仁等主办“社会科学座谈会”，多次举行有关社会科学讲座的，提高革命理论，以指导实际运动。当时在白沙巷王启霖同志住所秘密学习《资本论》，适值《资本论》第一个中文译者之一的王亚南同志路经贵阳，曾请王作学术报告，加深理解原著精神。“社科”还曾在达德学校召开座谈会，吸收青年参加。据周兴仁同志回忆，当时由方岳先生执河上肇著政治经济学读本讲解。除上述的人士外，还有高滔、谢六逸等先生参加。并请蹇先艾先生主编《十月旬刊》宣传抗日活动。此外同田君亮、梁原东、郭一虹，何战白等成立中苏文化协会，还组织了宪政座谈会等群众进步组织。中共党人张益珊自武汉来贵阳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，在华家山和六冲关等郊外进行活动。青年们高唱轰耳的《毕业歌》欢迎刘方岳先生发表演讲。演讲的结语是：“能领导中华民族取得抗战胜利的，只有中国共产党”。顿时，青年们激情满怀，热泪盈眶（此段是根据当时活动的参加者聂群、朱立彬的回忆加以整理的）。演讲完毕，在张益珊的率领下，方岳先生还与青年们一道操练游击战术。

青年们在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工委的领导下，得到刘方岳先生的革命历史故事的教育（巴黎公社史、十月革命史，岳飞的精忠报国等），纷纷走向革命的圣地——延安，走向抗日斗争的最前线。陶信镛、丁毅、方士新、周兴仁、严金萱等同志，带头到延安参加革命工作。聂奇慧、聂奇婉（聂群）、聂江林（聂伯纯）是先生的外甥，先后都参加到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行列。先生的儿女刘容、刘君桓也先后加入地下党。受到刘方岳先生的教育和影响，先后参加革命活动的还

有先生的学生田公群、田觉狮、李正裕、沈守鸿、朱世芬、张恒、华丹鹑、陈胤孙、饶元祚、尹克恂、丁酉成、朱瑞珍、王聚五等同志。

七、培养革命青年 迎接解放

四十年代末，是走向解放的伟大历史转折点。先生执教于贵州大学历史系、经济系并兼贵阳师范学院史地系教授，还兼贵阳中学历史教员。三份薪水还难于维持一家四口生计。国民党经济崩溃，政治腐败不堪，先生引雪莱的诗：

“冬天来了，春天还远吗”？教育学生，振奋精神迎接解放。解放即将到来，反动派的镇压更加严酷，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之后，先生与沈守鸿同案被国民党逮捕，惨遭特务辱骂和毒打，经至亲、富商胡松涛以巨款保释出狱。自此先生言行愈益谨慎，但斗争仍不松懈，联系至亲思想较进步人士杨世济和贾仁华两位教师，贾仁华老师从不同角度支持学生革命活动，在豫章、正谊等校利用讲解鲁迅的杂文之机，激励青年伸张正义；杨世济老师则暗中支持贵阳中学的学生运动。一九四九年初，在中共贵阳特别支部的领导下，以贵中为重点，掀起了四月十六日的贵阳八所公立中学的反饥饿游行斗争。该校高中三十二、三十三两期，成为学生运动的中心。

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，贵阳处在解放前夕，国民党反动派垂死挣扎，大搞白色恐怖。先父为了防避敌人的迫害，要我把一部收音机拆了分几处丢入学校几个厕所粪坑内（因当时有收音机人家很少，特务可能以有电子管而诬为暗藏发报机）。同时，还要我把家中珍藏的那部《资本论》也处理掉。当我于黑夜之中、持物走出家门

时，先父又叫我回来，取出《资本论》，嘱我只扔收音机（这部《资本论》中文第一版，一九三八年生活书店发行，至今由我珍藏）。父亲说若情况告紧，他将设法逃离贵州，要我照料母亲，不要挂念，待解放之后返黔欢聚。所幸不几日，解放大军神速解放贵阳。我的长兄、共产党员刘君恒身着解放军服，凯旋归来。先父的学生陶信镛、陶祖潜自三八年赴延安，相别十余年后重返解放后的故乡，带来我的二姐刘容自解放区进入北京的喜讯。全家沉浸在喜庆胜利的欢乐之中，誓以全力贡献给可爱的中华，遐想着无限美好的未来！

八、苏振华政委会见五教授

贵阳解放以后，三十年代贵州地下党领导人秦天真同志出任贵阳市委书记，向贵州省军政主要领导人推荐，由五兵团政委苏振华同志约见贵州大专院校的五位教授，即贵大田君亮、葛天回、丁道衡，师院肖文灿、刘方岳。在座谈中，先父以十分崇敬的心情，感谢解放大军迅速解放贵阳。同时，以史论道，诚挚地提出：“水舟相切，顺民而治”。五一年以后，先后被任命为贵阳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、民盟贵州省委委员会秘书主任、省政协委员等职。五七年父亲于整风中被错划为右派，但先父爱党之心一如初衷，埋头做好民盟传达室杂务，在凯里万潮或在龙洞堡省政治学校学习时，积极参加劳动。先父经常教育我，要衷心拥护党，解放以来，在共产党领导下，革命和建设事业，成绩卓著，并要我不懈努力，终能入党。

九、周总理约见刘方岳

一九七八年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阳光普照人间，省有

关部门为先父落实了政策。省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人员来访，要我协助整理周总理召见父亲的资料。家兄君桓适值返里在家，我兄弟二人听了来访者所言，一时愕然，因未听父亲说过总理接见过他。待父起床，问及此事，父亲方加证实。那是在一九六〇年周总理来贵阳视察短暂停留期间，拨冗约我父单独会见于云岩招待所。我追问父亲，为何二十余年不曾提及此事？父答：“总理告我，右派问题要改正过来，谆谆教导于我，要我坚信毛主席、坚信共产党，要教育子女跟党走。总理还深怀旧情，嘉赞我在里昂大学事件冲锋陷阵的革命精神。总理之伟大，我深感羞愧！未能革命始终，总理还能信任我，提及改正右派事，我怎能漏出一字，以影响总理威信呢！所以虽是妻室儿女，我二十多年始终守口如瓶。幸得小平同志主持大政，方有今日”。回想起来，当一九七六年元月八日总理逝世噩耗传来，父亲终日悲痛欲绝！同年十月，毛主席逝世，在省人委礼堂组织悼念会，当日适遇倾盆大雨，父亲命我用自行车载他前往参加，我劝告他，八十高龄的人，怎能冒此风雨？父亲坚持说：“中国革命没有毛主席，就不能成功，我一定要去”！我只得在大风雨之中，用自行车载父至省政协。那时门前小车云集，统战系统已集队待发，父亲怀着对新中国的缔造者——毛泽东主席的敬意，蹒跚地走在队末。我在队外，凝视身着雨衣的父亲，我的眼角润湿了！

十、父亲的遗嘱

父亲能以八十余高龄，亲睹中华之再建，为祖国之中兴，不胜兴奋！在生命临竭时，特嘱咐我，大意为：

（一）没有毛主席，中国革命不能顺利成功。我在英国读书时，与罗学瓚同住一屋，罗是毛主席青年时代的至交，

我见毛给罗的书信，笃信毛泽东政见过人。我们（指父与我）都是治史学的，历史发展那不几经曲折？

（二）历史已作出结论，在杭州，秦桧已跪在岳王墓前。历史发展曲折，但绝不要让岳飞跪着，秦桧站着，这是黄齐老当年率我们扫岳飞墓时所讲。以后你有机会去杭州，一定代我向岳王墓献上一束鲜花。我们的青少年时代是从唱满江红开始搞革命的。

（三）我那部《资本论》是黎子耀先生嘱我妥藏（黎现任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），你知道那是用生命保存下来的，是我的最大遗产，要传之子孙，你治史要以《资本论》为准绳。

（四）切要记着周总理的教导，紧紧地跟党走！二十余年我连累於你，是我的心病。现在小平同志掌舵，情况好了，继续努力，争取入党！

告慰于先父

“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勿忘告乃翁”。陆放翁的爱国诗章，自幼听到父亲反复吟咏。父亲的一生，历尽艰辛，为探寻救国之道，走过曲折道路。毛主席、共产党领导下，缔造了新中国！党的十二大，制定宏伟纲领，而今改革高歌入云霄！祖国前途光辉灿烂。我们的家庭，也呈现兴旺景象。

我的大哥君桓，在父亲去世之后，奉命出任驻法大使馆文化参赞，那里是一代中华爱国志士奋战过的地方。君桓专程至里昂中法大学门前，留影纪念，以继承志士们的遗志为誓。大姐刘莹退休之后为君桓操劳家务，使他安心工作。二姐刘容，于一九三九年入党，致力教育事业数十年如一日。党派她考入西南联大，又先后转移到太行、北京。在育才小

学三十年，默默耕耘，无怨无悔，今日她响应号召，高兴离职休养。至于我，也于父亲逝世的次年入党，实现了父亲生前的夙愿。今年是马克思逝世百周年，我以《资本论与历史科学》论文为祭。先父的最大遗产——《资本论》中文第一版，我精心珍藏！父亲啊，您的孙儿今年即将于云大外语系毕业，来信誓承家业——苦攻世界史，接过《资本论》，世代相传永不忘！

（上接17页） 毫无怨言，根本不提到这些。我还有什么说的呢！只能说老师始终言行一致，真是我们的师表、楷模。

回忆往事，历历在目，孰料在打倒“四人帮”后，党中央拨乱反正，伟大祖国正欣欣向荣的时刻，老师却溘然长逝！但是我相信老师在世时，已经看到了“四人帮”的覆灭，看到了革命的前途无限光明，其高兴程度不会亚于旧中国的解放，新中国的成立。如今，看到革命事业后继有人，社会主义建设一新，则更会含笑于九泉。

回忆刘方岳老师二三事

殷以柔

一九八一年秋，接到姐姐殷以文同志的来信，言及高中时敬爱的刘方岳老师在贵阳逝世，在筑同学都相邀参加了老师的追悼大会。我突然得到噩耗，悲痛万分，想不到竟不能见老师最后一面，而且也没有参加追悼老师的大会来表达我对老师的敬意，仅以此回忆来寄托我的哀思吧！

一、把课堂作宣传民主思想的阵地

当我还在初中读书的时候，就已听说方岳老师是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，思想很进步，他回国后在贵州进行了很多马列主义的宣传和抗日民主爱国活动。那时我年龄还小，再多的情况也无法去知道了。由于老师的次子刘君卫同志当时是我同班同学，他家就住在贵阳中学的教师宿舍（很简陋的木结构平房），因此我去他家时能经常看到老师。老师总是笑眯眯的，那么和蔼、那么平易近人。他因为还未教我们的课，对我们说话还是不多的。但是我们多么渴望老师能给我们上课呀！后来我们刚升入高中，就知道刘老师上我们的历史课，同学们的高兴就不用说了。

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已经撕掉国共合作的伪装，公开打出反共的旗帜，大规模地进攻解放区，刘老师讲课已不便明显的宣传共产主义。但是作为历史老师，尊重史实，这是无可

非议的。所以老师在外国史中，讲到巴黎公社时，特别慷慨激昂，把当时法国工人阶级不屈不挠英勇斗争的伟大场面，讲得淋漓尽致。同学们只听得鸦雀无声，从中领受了工人阶级只有斗争才能得解放的道理，激动得心快跳出来了。讲这部份，即使不提主义等等，也是要冒极大风险的，但老师对此却义无反顾。

在讲本国史中，老师也善于借古喻今，如讲唐史时他说：唐之所以能兴盛二百多年，归功于太宗，而太宗其人知人善任，豁达大度，对于反对他和给他提意见的人，不是动不动就一关二杀。边说边把两手摊开，形象地表现出宽宏大量的气魄。言下之意，暗示了蒋介石反共反人民，迫害进步人士的罪行。不用明说，同学们就心领神会，增强了对反动政权的仇恨。

二、良 师

方岳老师不仅利用教学来宣传革命思想，培养青年正义的道德品质，而且教学质量上也是一丝不苟，内容谨严。老师在讲课时一般是没有讲稿的，即使准备了讲稿他也不看，但每一个年代从未讲错，可见其备课用功之深，同学们极佩服老师的记忆力。此外，老师还特别注意培养学生的笔记能力，他总是在黑板上写一个题目后就用口述，同学们作笔记，课堂上一片沙沙写字声。他怕同学们睡觉，有时还特别强调一下，提醒大家注意，说：“噫！你们还记得什么什么……吗”？以此来引导大家集中注意力，其实这只是老师在教学上要求严格的表现，而同学们听他讲课就像听“龙门阵”一样，根本不会打瞌睡。

老师除了把重点和结论在黑板上写出来以外，其余都是